

#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明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戚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刘涛雄 黄文夫 启文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刘涛雄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常务) 白卫星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何超

第 108 期(总第 221 期) 2015 年 7 月 19 日 星期日 乙未年 六月初四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2015 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基本分析

■ 经济学家周报

■ 魏加宁:大家早上好,感谢新供给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声明,以下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不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意见。第二点,本人只是一个学者,完全是从学术角度来进行探讨。

**第一方面,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解读当前经济走势的时候,大多数人经常用的是一个“新常态”来解读,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如何看待这种经济下行,我个人认为仅仅用一个“新常态”是无法解释或者至少不能全部解释。为什么 2007 年还是百分之十几,今天到了 7%,甚至不到,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或者从三个角度我们要进行观察。第一个角度从长期,再一个是从中期,再一个是短期。

从长期来看,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这是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大家可以观察我们把有关潜在增长率的一些测算汇总以后,可以看到平均数字,潜在增长率不断地在下降,现在看到的“十二五”下降到了 8.05,“十三五”最高的估计是 8.50,最低的估计是 6.08,平均值是在 7.19。进一步的,如果再往前走十四五有可能下降到 6.35,“十五五”将会下降到 5.45。确实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是在下降。

下降的原因,包括人口结构问题,技术创新的问题,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等等,确实有客观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年,也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十年,上届政府时期改革放缓,甚至停滞,甚至在有些领域还出现倒退。包括比如说人口,人口红利将要消失,刘易斯拐点问题人口学家早就提出来,提出来以后非但没得到政府的认可,反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判。耽误了很多年,大家想一想,即使现在出生的孩子,要想成为劳动力至少也是 16 年以后的事儿了,如果继续拖延,就会更影响发展。如果我们早一点改革,早一点把计生委改了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情。包括创新不足,为什么创新不足?大学行政化严重。这种行政化的体制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值得怀疑。另外产出比例上升,投资效率下降,和国进民退有很大关系,资源大量的配置到国有企业,效率一定是下降的。所以,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长期来看也并不是宿命论,通过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

**第二个方面,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条件下分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值得注意的有一个创新周期,创新周期和景气周期往往存在一个逆相位的关系,就是此消彼长。**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家都在忙什么?都在忙着生产、制造、销售,赶紧把产品卖出去,这个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你去搞重组,成本会很高。反过来经济形势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大家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研发、创新,搞兼并重组的成本也比较低。所以,从创新重组的角度看,形势不好的时候恰恰是兼并重组的好时候,这是关于创新周期我特别想说的。

再有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中国存在一个改革周期,这个改革周期就是每当我们经济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内外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一轮高潮,改革开放进入一个高潮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过去 36 年非常明显的波动,第一个周期是 80 年代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一场大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以后吸引外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到 80 年代两次过热。

第二个周期是“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跌到了 3%、4%,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盘根错节,经济一片萧条,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一场大讨论,通过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形成一个新局面,形成大好的局面,投资者投资欲望就上来了,改革开放一系列措施一出来,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到 1993 年需要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把过热压下去。

第三个周期。90 年代末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当时提出保 8 的口号,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加入 WTO 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又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我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下,政府抓住机遇,中国加入世贸,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推动

**编者按:**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与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主办《新供给二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于 2015 年 7 月 4 日在北京举行。现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以及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作的主旨演讲发出,以飨广大读者。

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做了一系列事情。所以,过去金融危机前十年高速增长,靠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改革的红利是米榕基那届政府改革的红利。如果我们不加入出口可能不会有那么快增长的增长。如果当时那届政府不搞住房制度改革,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业带来的相关的钢铁、水泥所谓重化工的快速发展。不搞国企改革可能不会有后来所谓的国进民退吗?当时的国企什么状况?企业到处是下岗职工,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设立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中心,这些中心都是只进不出。当时的金融改革,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在政府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下,改革红利显现有一个滞后期,到了胡温这届政府红利显现出来。所以,根据这个基本训练就是,要想走出危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思想解放。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之所以中国经济还是在往下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解放没有到位,包括各种互联网的应用上遇到的,各地政府阻力还有很大。

在短期看,谈几个主要的观点:一个对外。外部进出口主要是外部的实体经济前景不佳,大家可以看到国际组织最近纷纷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联合国从 3.1 下调到 2.8,OECD 从 4.0 下调到 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 3.8 下调到 3.5,世界银行从 3.4 下调到 3.0,国际组织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调整乐观,世界经济前景不好,出口肯定是往下走。

**第三方面,看消费。**我们首先看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八项规定,反腐败等一系列措施,政府的消费明显是在下降,政府消费在全社会消费里比重占到 30%左右,政府消费下来一些高档的饭店开始关门了,要么转型了。统计局做的统计,各级政府官员饭局的频率和时长都大大地缩短了,饭局频率在减少,时间也在缩短。政府的消费在 20%—30%之间,政府消费在萎缩,整个社会的消费,其中还有乘数效应,整个消费是在往下走的。

**再看投资,投资也是先看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审计地方债——前年审计署刚审完,去年财政部又在查,这就使政府官员没有这个积极性。**这种情况下投资肯定是往下走,固定资产投资往下走,三驾马车总的来讲都是这么一个趋势。这里面必须做一个强烈的声明,大家别误解好像我不赞成八项规定,好像我不赞成反腐败,好像我不赞成审计地方债似的?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三项措施都非常正确。八项规定带来非常好的官场风气,反腐败减少了很多交易的成本,有很多专家也有测算。再有审计地方债:2003 年主张让地方政府发债,发债之前把地方政府现在具体债务查清楚,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现在审计地方债非常正确,不仅要审,而且要制度化,每次换届都应该这么去做。不能因为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定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它对经济增长确实是有负面影响,这要实事求是。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能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定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该做还得做,反腐败、八项规定都应该继续执行,审计地方债还应该制度化。但是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怎么办?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来把民间消费搞上去,让民间消费替代政府消费;通过改革把民间投资搞上来,让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唯一出路,也是未来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大家都很关注换挡,换挡就是从政府投资的档换到民间投资的档,这是换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政府消费换到民间消费,这是换挡的一个真正的含义,还不完全是一个快慢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档。很令人担心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往下走,民间的增长速度也是往下走的,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速度还要快。去年这个时候,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全社会的投资增

长速度还高三个百分点,到了今年 1—4 月份是 0.1 个百分点,这才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得更快。现在炒得很热的创业、创客,都是没钱的人在创业,有钱人在做移民,资本外流很快。根据报纸上报道的,(由于)资本外流,一季度国际收支逆差 800 亿,(创)历史新高;贸易项下值是顺差,资本账户就更高了——大量的资金外流,现在都到国外上各种课程,去世界各国的名校游学。这样一些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因为现在的不确定性太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反腐败,还有改革方面等,方方面面很多不确定性。

**再有统计因素。**统计数字水分确实年年有,但是不同的阶段方向是相反的。当经济过热的时候,这个数字是要低报,明明有 15、16 的增长速度就报 11、12;当经济增长速度低的时候,就会高报,明明只有 3、4,它要报 5、6、7、8——大家到地方调研就知道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

这样一些问题我非常担心。有研究经济周期的专家说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收敛的,后来我说不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收敛了,是被统计数字收敛了,背后的波动可能比看到的数字要大得多。

这里面讲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住院期间,受到领导人接见时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这么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最后一次见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最基础性的事情。**仔细思考,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1958 年大跃进粮食数字造假。**孙冶方先生曾经当过统计局的副局长,他很清楚统计制度的毛病,不是人为,是制度的问题。孙冶方先生在改革初期就提出这样的理论,基础性的改革我们到现在都做了,大家怎么对改革抱有信心?

如何看待未来的经济走势,还是三种情景:第一种,如果改革形势大好,刚才讲的像 1992 年那样,中国经济仍然会出现一个增长速度反弹,虽然不会像过去出现超高速增长,但是中高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宏观调控主要是防止通胀。第二种,改革如果步履维艰就有可能出现滞胀。厉以宁先生提出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 6%以下,通货膨胀在 4%以上。第三种情景如果改革预期崩溃,就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资本大量外逃,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出现通货紧缩,高速增长下掩盖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都会暴露出来。很有意思的现象,IMF 去年对中国经济也有一个分析报告,也用了三种情景假设,也是和改革挂钩,包括迅速改革,中间情景和不改革。它的结论和我最后结论是一样的,如果不改革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增长急剧下滑。关于如何看待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我同意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对的,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并不会像我们有些人期待的平安无事,很可能许多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可以看到,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居然是负增长,也就是说银行把钱贷出去,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没见到钱,而且是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值得关注的。

在当前这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我们的正确对策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观点,一种主张输血,打激素,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形象,也就是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继续增加投放。还有一种观点是新常态被一些人理解为不用着急,适应一下就好,有点像打麻药,止痛针。第三种主张就是赶紧动手术,止血。

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必要的输血、打点儿麻药,打点儿止痛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我们光输血,光打麻药,光打止痛针不去动手术的话中国经济就可能出大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做手术。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我们要解放思想,微观上要加快创新重组。刚才我讲了周期的道理。从宏观上来讲我们每次低谷的时候都是通过思想解放来推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的规律,规律不去遵守就没办法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加快解放思想,改革就没办法推进;改革没办法推进经济肯定起不来,或者短期的靠打激素很快就會掉,现在中国刺激经济的力度是递减的——刺激过后会很快掉下来,会越来越往下——这么一种递减的趋势。

(下转 02 版)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与时俱进的成思危先生走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等身著作的学术遗产,更留下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

## 纪念成思危先生

■ 吴良顺 路华卫 清华大学

2015 年 7 月 12 日凌晨阴阳交错时刻,成思危先生悄悄的驾鹤西去,身影难挽,我们为顿失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悲恸不已。思念长留,我们在缅怀先生为国为民之高尚情怀和丰功伟绩之际,更念及如何以先生为楷模,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出身于书香门第又与时俱进的成思危先生走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等身著作的学术遗产,更留下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要学习他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精神。**

这特别表现在他对“唯 GDP 论”的批判上。他曾尖锐地指出:“含‘水分’的 GDP,第一类是有害的 GDP,例如豆腐渣工程,这类工程在建设时能产生 GDP,垮了以后重修还会产生 GDP,但是它有害的、负面的 GDP;第二种是无效 GDP,即建设的时候能产生 GDP,但是建成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投产,因而就不能再产生 GDP 了;第三种是低效 GDP,例如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大,建成以后不但没有回报,还要依靠政府补贴。”他的这些意见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

**再者是学习他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成思危先生早已被誉为“风投之父”,时下正在着力推进创业板运行,本文不拟赘述。而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不加分析地当成阴谋,动辄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成先生指出: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这其中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但更多的人有着不同的动机。不管动机如何,这种以抗击被咬战略目标的金融安全观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缺乏说服力:一是要真正提高抗击阴谋的能力,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还是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无法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二是当前国际金融领域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筹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要学习他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精神。**

成思危先生曾经担任过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繁忙,但是,他仍然在好几所大学带博士,更是直接置身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兼任院长。而且他还在各个学校带读学生近 10 名。除非公务繁忙确实排不开外,他每个月都要用一两个小时,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里晤面同学,听取同事们汇报各自的学习情况和研究进展,或就某一题目深度汇谈,随即作深刻的点评和阐述。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成思危先生在本报(编者注:经济学家周报)组织的“2013·首都

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提出著名的学者应坚守的“四大责任”,这已经并将继续促进青年经济学者之为人和修学的不断进步。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他说,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作为官员,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而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作为领导,没有时间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有的领导干部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出台以后就要去执行,但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尤其是细节问题可能没有认真考虑。作为学者,就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跟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使经适房分配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

**第四,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常举这个例子——房改初期,妇联写了一个情况反映结婚的人多了,离婚的人也多了。什么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结婚的人多了是为了赶上最后那班福利分房:你不结婚不能分给你房,那就赶快结婚,再结婚;离婚人多了是因为两个人有两套房,到时候只能给你一套,所以干脆离婚,一人保一套房,至于以后能不能复婚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说,很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是想不到,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问题的难点。

斯人已去,后辈们会铭记其教诲,恪守学者的历史责任,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祝愿成思危先生一路走好。

**链接**

### 七律·悼成思危先生

■ 吴良顺 路华卫 清华大学

富国强民赤子心,  
杖朝不忘披征尘。  
香江夜雨独行客,  
华美朝晖奋发人。  
鸿池奔走推创业,  
宦海浮游见真纯。  
卧听股市风云怒,  
笑慰天下又一春。